

田忠俠 著

辭源 通考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田忠俠 著

辭源 通考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辞源通考/田忠侠著. 福州: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2.10

ISBN 7—211—03917—5

I. 辞… II. 田… III. 辞源—考证 IV. H1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2976 号

辞 源 通 考

CIYUAN TONGKAO

田忠侠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州兴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仓山区工农路 423 号 邮编:350007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52.5 印张 4 插页 2002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

ISBN 7—211—03917—5

H·140 定价:8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赵 序

《辞源》是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之一。它始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,成书于民国4年(1915),到今天已经80多年了。1931年出版了《辞源》续编本,1939年出版了这部书的合订本。它出版以来,曾为不少人案头必备之参考书,时时翻检,受益不少。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,它也存在一些缺点,就引书来说,它引的书证并不就是始见书,有人曾经评价说“《辞源》无源”;再有就是引书只列书名或作者名,不详注篇名或卷次,读者难于检核。当时报刊杂志上面有不少评论文章,都指出了这一点。

新中国建立以后,百废待兴。《辞源》已经不能够适应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,有人提出修订《辞源》的主张。1958年春,中央文化部召开会议,决定对旧版《辞源》进行修订。当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修订工作。1964年7月修订稿的第一分册内部发行,由于大家熟知的原因,以后几个分册都没有出版,这次修订工作就这样夭折了。

1975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,《辞源》的修订再次被提上日程。由商务印书馆和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河南四省区共同协作进行修订工作。到1983年四个分册出齐,1988年又出了该书的合订本。这就是今天大家所说的《辞源》修订本。旧《辞源》引书方面的明显缺点得到了纠正,书的质量也大大提高了。

但是也应该看到,这种大型语文工具书,集体修订,成于众手,罅漏在所难免。《康熙字典序》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好:“当其编辑皆自谓毫发无憾,而后儒推论,辄多同异。”从编者来说,经过初编、复审、终审,认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,可以付排了。但是不同的人在使用的时候,

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,又会发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提出一些意见也是正常的。

田忠侠教授历经22年的潜心钻研,先后著成《辞源考订》(1989)、《辞源续考》(1992),在学术界颇有影响。近年又继前二书续为考、辨、订、补,汇而通之为《辞源通考》,考订条目由原来两书的2825条增补为7175条,字数由70万而累积充实为150万。这样全面对一部大型辞书作如此深入的剖析,在中国辞书史上,还是首创。

全书将《辞源》不尽完善之处由原来的12项充实拓展为15项,这里虽然是讨论《辞源》一书,它所涉及的问题,其他大型语文辞书可能都或多或少存在,从这个意义讲,忠侠教授提出的这些方面,对于其他辞书的修订也是有普遍参考、借鉴意义的。

读了这部书,颇受教益。首先是作者的敬业精神值得佩服。记得1987年在浙江富阳召开的训诂学年会上,见到忠侠教授,他提交大会的就是一篇关于《辞源》得失的文章,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后来陆续读到他的《辞源考订》和《辞源续考》,知道他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,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几年前听说他正将自己研究的心得汇总成《辞源通考》一书,从该书的《自序》和《绪论》里面,我对忠侠教授的了解也更多了一些。22年来他一直扑在这项工作上,正如《绪论》中所说:“艰辛险阻,备尝之矣。人事纷烦,听之而已。我行我素,真谛是求。”从丁壮之年一直干到六十花甲,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全用在别人看来是枯燥乏味的工作上,特别是当前经济浪潮的冲击下,能够甘坐几十年冷板凳,不为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所迷惑,的确令人叹服。如果有更多的像忠侠教授这样的

人参加进辞书编纂和修订的行列中来,我们的辞书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。

忠侠教授热爱《辞源》,从他在《自序》、《绪论》、《跋》对《辞源》的高度评价完全可以看出,他对《辞源》的学术成就是褒扬有加的。他说“修订本《辞源》问世,以其体例之完善,考据之精审,释义之详明确切,体现修订者严肃、认真之科学精神,使该辞书详、赡、赅、博,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之古汉语辞书。”“爱之弥深,求之愈切。”正因为如此,他才愿意把发现《辞源》的缺失作为己任,用一生最宝贵的年华投身到《辞源》的研究工作中来,为今后的《辞源》修订提供参资,亦为其他辞书编纂与修订之借鉴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作者有相当深厚的传统语言文字学素养,对于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文献知识颇为精熟。从《绪论》所列举的十五大方面的问题,可以看出它涉及了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勘学的方方面面,没有这方面深厚的功底是发现不了这么多问题的;发现之后能够辨正其得失,指明其是非,又更需要有认真负责的精神才行。

一些常见的问题,一般读者往往一滑而过,不仔细去推敲。如《辞源·艸部》“莫”字下面的“莫莫”条的第二个义项引书证题作:《汉书·八七上·扬雄传·羽猎赋》。作者指出这里引史传人物作品,标目可商。因为《汉书·扬雄传》这篇赋题作《校猎赋》,《昭明文选》题作《羽猎赋》,书名既取《汉书》,那么文题也应该根据《汉书》,否则,读者在《汉书》里面如何查检得《羽猎赋》?

又如《羽部》“翩翩”条的第三个书证是白居易《长庆集·四·卖炭翁》作“翩翩两骑来自谁?黄衣使者白衫儿。”《卖炭翁》是一首人们常读的诗,作者指出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两种本子“自”都作“是”,而不作“自”。

《辞源通考》这部巨著,反映出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很留意文化知识,很多地方都在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解释。力求各条件都要切于“辞源”之名义。特别是地名、姓氏义项,作者花的工夫更多。《辞源》很多地名都没有叙述得名之由来,如“永”字头下面的地名“永善”、“永兴”、“永嘉”都是如此,作者在书中都根据文献考证它们为什么会叫这个名称:对于一些字表示姓氏的义项得名受氏之源,亦多精彩的解说。

这部巨著佳处甚多,胜义纷呈,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传世巨作。值得郑重地向读者推荐。

当然,书中也或有个别的地方不是完全不可商榷的,特别是有关释义的部分,有些还是见仁见智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,也许会觉得作者的解释,尚有可商,那也没有什么。真理愈辩愈明,完全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。有些地方《辞源》的体例规定如此,书中根据体例作了那样的处理,忠侠教授认为不妥,作了许多补充辨正,这对于辞书的修订也是有益的。

蒙忠侠教授不弃,邀我作序,实在惶悚,写了这样一些感想,算是对这本书的看法吧!

赵振铎

2001年7月24日

于成都望江路29号桃林村

曹 序

在辞书学界,我们很早就注意到田忠侠同志在辞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。他的研究别树一帜:专事辞书考辨。认真地学习《辞源》,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给《辞源》作考订,极其勤奋地查证大量的资料,潜心研究,于是写出了学术考据专著《辞源考订》(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)、《辞源续考》(199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)。两书共考订《辞源》疏漏欠妥之处2825条,计70多万字。于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,并博得《辞源》编者的认同。现在的《辞源通考》,便是继二书之后,再作深入研究,考、辨、订、补,续写而成的,计得7175条,都为150万言,洵为皇皇巨著矣!

以某部辞书为研究对象,特别是像《辞源》这样大型的辞书,要进行考订,其难度极大。昔人云:“读书得间”,意思是说进行研究贵在能够发现问题。《辞源通考》作者的高水平正反映在能够敏锐地发现诸多问题。这些问题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去看。从广度上说,这本书所研讨的问题涉及到词目选取、注音正误,义项安排、释义的准确妥贴、溯典与书证的时代先后、文字讹误、标点确当、引书考源等方方面面,这正反映了作者学识的渊博。从深度上看,有的问题属表层的,如周穆王八骏之一的“奔宵”当作“奔霄”(见“八骏”条),又“犀利”条中引出“唐故相国赠司空令孤公集纪”,“令孤”当作“令狐”。书中相当多的条目属深层次的考辨问题。如“先君”条的书证二引宋代邵伯温《闻见前录·邵博(序)》:“伯温早以先君子之故,亲接前辈。”《通考》指出:“此《序》乃伯温自作的原序,非博

所为也。”邵博是邵伯温之子,邵博的《序》是该书中的另一篇,《辞源》编修者没有细察二者之不同,所引书证导致子冠父戴。这些方面反映了作者学养的深厚。浅学之辈是难以发现这样深层问题的。所谓表层的问题,能够发现也非易事,因为只有古汉语造诣很高的人,才能对这些问题有高度的敏感性。

《辞源》是一部优秀的古汉语辞书,其中也有一些错误,王力先生曾提出批评,但是,王先生写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仍把它作为主要的参考书,认为《辞源》“材料丰富,令人钦佩”。《辞源通考》无疑对我们利用《辞源》是大有帮助的。《通考》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字词考源的内容作补充。考源当考到一个什么程度,不同的人可能会持不同的态度。这是辞书编纂者的事了。《辞源》在修订时,《通考》中的这方面内容或许不一定都吸收进去,但是,对我们读者来说,仍有重要参考价值,因为可以起到“广见闻”的作用。

1997年中国辞书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年会,与田忠侠同志相见。对他多年从事《辞源》的考订工作极为敬佩。22年,焚膏继晷,无间寒暑,他把自己宝贵的年华都用在研读《辞源》和《通考》这部书的写作上了,这种孜孜以求地推动学术文化进步的精神,很值得我们学习。现在《辞源通考》即将出版,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。

曹 光 祖

2001年7月31日于北京

汪 序

田忠侠教授的《辞源考订》《辞源续考》是已产生影响的著作。1995年中国辞书学会在哈尔滨召开第二届年会时,有人曾询问我的看法,我因为只随意看过若干条,不敢妄加评论,只以“对《辞源》的修订有益”作答。会中,我与田先生和几位朋友同游松花江、太阳岛,一面观赏风景,一面交流情况,知道他仍在继续对《辞源》的研究。

对田先生的博闻强志和勤奋我是很钦佩的。从1979年至2000年,他三读《辞源》,三为考订,焚膏继晷,兀兀穷年,积22年的精力成此《辞源通考》巨制,这种锲而不舍探求学术真谛的精神是可同朱起凤著《辞通》(1896~1930年),符定一著《联绵字典》(1910~1940年)相比的。

8月中,田先生打来电话,要我为《通考》写一序言,并寄来几种参考材料,我曾读过《辞源考订》周大璞序,《辞源续考》徐复序,而《通考》已有赵振铎序,曹先擢序,林玉山序。有了这些先生的序和作者自序、绪论,我想该说的话大约已经说完,我说什么呢?

上面我提到《辞通》和《联绵字典》。80年代初我购得《辞通》,翻了几页之后,便被那几篇序吸引住了。章太炎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大白、林语堂、程宗伊、夏士尊,仅凭这些学贯中西,在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名字,就令人对《辞通》一书肃然起敬了。符定一的《联绵字典》有黄侃序、王树丹序,而封面题字是毛主席的亲笔。

读序跋有时很有些乐趣,从中可以知道著书的缘起,经历的困难,前人的疏失,本书的价值,等等。有写得实事求是的,有写得浮夸不实的,也有敷衍应酬的。涉及对某书的评价,有的

会说是至善至美,有的会骂得狗血喷头,如钱玄同之斥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佩文韵府》为“瞎凑杜撰,诸恶毕备,连抄书都不会”的“劣书”,刘大白之贬《辞源》为“杂凑乱抄”、“谬误百出”的“商业化的产品”。他们以贬斥为铺垫,反对对所序对象《辞通》的颂扬。

我很赞成《通考》作者对《辞源》的态度。作者在《自序》中把《辞源》比作沧海,比作高山,比作良师。而他考辨的目的在于“匡其不逮,臻其完善”。而且这种“匡其不逮”的考辨是“草创者难为功,纠摘者易为力”。这和有的人以批判否定有影响的著作来炫耀自己的学识为能事,决不相同。

我从1975年从事辞书工作至今,快30年了,深知辞书编纂的难艰。钱玄同斥《康熙字典》《佩文韵府》,刘大白贬《辞源》固然偏激,但他们都重视“抄书”,是不错的。《汉语大字典》主编徐中舒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大家说:“要好好抄书,不要抄错了。”我以为《通考》的最大贡献,就是对修订本《辞源》的“抄书”作了一次大范围的清理,指出了《辞源》在资料征引和知识方面的大量错误和缺陷。全书考证7175条,大部分都涉及到资料,涉及到“抄书”,这是最不能小看的事情。资料是辞书的基础,也是考辨的基础。《汉语大字典》的主要引用书目有2965种,参考书692种,川鄂两省四百多人制作卡片达两年之久。按字头分装的一袋一袋的卡片,在编写时要做十分烦琐的排列组合,有时要在乒乓球台上才能铺开。其中甘苦,不是个中人是不能体会的。制作卡片,编写书稿,考证辨析,反复核对资料,是无穷无尽的苦役,即令是如钱玄同、刘大白的硕儒通人,大约也不能避免差错。《通考》一书,协助制作卡片,核对资料有

40余人。而这种抄书是在发现问题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的,它包含着考辨,因此可信程度和学术价值很高。

田先生的书名叫《通考》,这书名本身就反映了该书内容的广泛。1979年《辞源》修订本出版时,总纂者之一的刘叶秋先生曾约举旧《辞源》有七项缺点及失误,而《通考》则约举为十五个方面:一曰立目失当;二曰音项残缺,致音、义不符;三曰释义欠妥;四曰释义不全或义项阙失;五曰徒举书证或概述典故而失注语义;六曰溯未及源;七曰书证与词、释义不相应;八曰书证时代、作者、书名、卷次、篇目之误称;九曰妄改古书,强经合己,不务我注六经,乃欲六经注我;十曰书证引文不确;十一曰引书证轻视虚词,时或夺误;十二曰引古书误施标点;十三曰行文失于缜密;十四曰释文体例不一,亟待严明;十五曰技术失误。

如果从考辨所涉及的方面看,新《辞源》的“十五”和旧《辞源》的“七”似乎是说《辞源》每况愈下,愈修订愈糟。不是!《通考》是一本大书,和一篇几篇论文不同。从研讨对象赖以组成的各个因素看,田先生的“十五”面虽广但仍未囊括全部。字词的形音义和书证,每一个方面都可作若干划分,一如陈垣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,列举沈刻本《元典章》的疏失计六类50目。又如杨树达《古书句逗释例》对标点古书句读失误的原因所作的细致划分,这都是做学术研究的常例,不足为奇。重要的是看这些考辨是否有理有据,是否能成为的论,至少是能成一家之言。田先生的考证精到的见解时有所见,多有可取,如“根深柢固”和“深根固柢”,《辞源》释义不加区别,《通考》从三方面进行分析:①从语法结构而论,“根深柢固”为两个描写性主谓结构联合,是说根柢扎得怎么样;“深根固柢”为两个动宾结

构联合,形容词深、固皆活用为使动词,即使根柢扎得深、固。②从主、客观而论,“根深柢固”属客观、已然;“深根固柢”属主观、将然、未然;③就思想含义而论,“根深柢固”是“根基牢固,不可动摇”,而“根深固柢”却是“要使根柢扎得深入而牢固,无使动摇,以求生存”。又如《康熙字典》的成书,《辞源》说是“根据《字汇》《正字通》二书增订而成”,《通考》据康熙皇帝“增《字汇》之阙遗,删《正字通》之繁冗,勒为成书,垂示永久”之谕旨,改“增订”为“增删订补”。而最为可取的我以为是关于姓氏寻源、地理历史沿革、历史人物条目的考证。

以一己之力,成此大著,为我国辞书事业的繁荣作出显著贡献,是值得称颂的。

我和作者相识有年,深知作者对《辞源》“爱之弥深,求之愈切”的良苦用心。而我多年的思考习惯,已把每一位同仁的论著和我们国家的辞书事业联系在一起,所以对作者积20余年心力著成的成果,也自然会“爱之弥深、求之愈切”,以审视的目光加以思考、分析。

我以为《通考》也有偶失,主要在有些结论的匆忙和一些建议不尽合辞典编纂工艺的某些常情,在某些方面本可不必议论而大加议论;在指出《辞源》“释文体例不一”时,本身行文措辞也有某些随意性,体例不尽一致。

人无完人,金无足赤。《康熙字典·序》中所谓说“善兼美具”,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,理想的追求,《辞源》是这样,《通考》也是这样。我希望这本著作出版后,作者和出版社广泛征求意见,共同努力,加以修订,使它更有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。

汪 耀 楠

2002年9月3日

序于湖北大学寓所

林 序

我和田忠侠先生，神交已久，然而，十余年间，惜乎未曾谋面，彼此都感到遗憾。

1997年11月1~5日，中国辞书学会第三届年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。由徐祖友先生引荐，我们终于见了面。真是一见如故，“恨相见得迟，怨归去得疾。”喜相逢，匆匆又别离。田先生热情豪爽，坦诚笃直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一见面，他就说：“1984年就读到先生大著《汉语语法学史》，近年又读到新著《中国辞书编纂史略》、《辞书学概论》，获益匪浅！”我赶紧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田先生学术成果斐然，令人钦佩！”大家的笑声，融合到一起了。

会议其间，我们几乎天天“携手日同行，相与细论文”，语言学，辞书学，考据学，经、史、子、集，辞书现状、编纂与修订，学术道德与良心，文人交往，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，不一而足。当我得知田先生继续考、辨、订、补《辞源》时，很感兴趣，赶紧追问：“有了婆家吗？”田先生也风趣地回答：“尚待字闺中。”我赶紧说：“哪就嫁给我们福建人民出版社好呀！”田先生欣然同意。

我之所以敢于毅然约稿，是因为我曾拜读过田先生此前所著《辞源考订》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89年5月1版）、《辞源续考》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9月1版），两书考订《辞源》，疏失2825条，言之凿凿，不作空论，笔笔有据，令人信服。不仅订《辞源》一书之误，而对其他辞书的编纂或修订，也有参考价值；读者也可从中学习考据方法，治学严谨的精神，春风大雅的宽容与自谦。他虽发现《辞源》诸多失误，并考、辨、订、补之，却不掩人之善，而对《辞源》其书褒扬有加，甚至发出“浩浩乎，大哉《辞源》”之嗟叹。

两书面世后于海内外学术界深得好评。所以，我便在拙著《中国辞书编纂史略》、《辞书学概论》二书中引用田先生《辞源考订·绪论》观点，阐释《辞源》学术价值及其得失。我心中有数，信心十足，才敢于大胆约稿，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考、辨、订、补《辞源》7175条、都为150万言的皇皇巨著《辞源通考》的来历。

回福州后，我即着手选题申报工作。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选题申报，有一道严格的批准过程。先是责任编辑填写选题申报表，然后交编辑室主任审查通过后，组织编辑室讨论，然后上报社选题研究委员会讨论，以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，最后报社法人代表审定批准。我们福建人民出版社很重视这部学术巨著，然而，当我把这本书稿交给辞书室主任安排时，辞书室没有一个同志愿意接这本书稿，感到非常的繁难。1996年以后，我从辞书室调到社协理部，协理部工作主要是终审稿件，参加选题的讨论批准，一般不直接责编书稿。在辞书室没人接这部书稿时，社领导决定叫我当责编，并且派两位退休的原辞书室张仰望、薛剑秋副编审协助我工作，这本书稿的编辑工作才得以顺利启动。接下去就是审稿的艰难，书中所涉范围十分广泛：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佛经道藏，天文地理，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语言学（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语法、修辞）、民俗学、文献学（版本、目录、校勘），乃至医史人物、流派、典籍、理法方药、阴阳五行、四诊（望闻问切）、八纲（阴阳表里，虚实寒热），而行文所用文字之古体、异体、甲骨、金文、小篆、全书通稿的文言表述；核校全书考证引用之文献资料的艰难；上自甲骨、金文，十三经、二十

四史、历代笔记小说、杂纂，又涉及版本的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部丛刊》三编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类书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等，下至晚近学者之著述之异同；排版的艰难，造字的艰难，校对的艰难，克服了一道又一道艰难，这本书稿才得以与读者见面。从2000年8月田先生亲携一大旅行包手稿3666页，送到福州，历时两年多，作者、编者、审校者，都为这部书稿的问世，付出难以估计的辛劳，才使本书更具学术价值，品位更高，编校印刷质量更好。

我在拙著《中国辞书编纂史略》（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）中，即道出该书前身《辞源考订》价值所在：

田忠侠对新《辞源》有很中肯的评价。他说：“修订本《辞源》的出版，以其体例之完善，考据之精审，释义之详明确切，体现出修订者严肃、认真的科学精神，使该辞书详、赡、赅、博，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古汉语辞书。所引书证，多经覆按原书，并一改往昔辞书体例之陋略，详注书名、卷次、篇目（甚至版本），除引子、史、总集、类书、字书、明清小说以外之其它著作，皆详标时代、作者，极便覆按。词语溯源，多有进步；义项确立与分列更趋完备；词目取舍调整更切实际，多音多义字分别注音释义，复音词下标明读音；且就总体而言：乃删旧《辞源》之繁芜，简而括之，增旧辞书之阙遗，补而释之……凡此种种革新与进步，都足以显示其学术价值超越历代语文辞书之上，实为我国辞书编纂事业的又一丰碑。（田忠侠：《辞源考订·绪论》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，第3页）

新《辞源》虽有很多优点，但也有些不足之处。田忠侠的《辞源考订》即收该书失误而考订948条，技术失误举例155

条。主要问题是：①溯未及源；②引文不确；③书证时代、作者、书名、卷次、篇目误称；④释义欠妥；⑤妄改古书，强经合己，不务我注六经，乃欲六经注我；⑥徒举书证或概述典故而失注词语含义（述典中亦无体现），失却立目之价值；⑦引古书误施标点；⑧行文失于缜密；⑨立目失当；⑩书证与词目、释义不相应；⑪释义不全或义项阙失；⑫技术失误。

1992年，田忠侠先生又出版了《辞源续考》，又从上述十二个方面对新《辞源》考订、辨伪、补释，收录1722条，其中考订1582条，技术失误举例140条。

现在，田忠侠先生又写成了《辞源通考》，将不尽完善之处由原来的12项扩充完善为15项，增加的三项为：①历史地理名源之探赜；②华夏姓氏考源辨宗；③类书称引标目不确之覆按。新增条目4348条，全书，共收条目7173条，字数150万。这样田先生就使他这部学术考据专著，更臻完善，更有学术价值，更具深远而广泛的社会意义，也更富权威性了。

除张、薛二位副编审通读《辞源通考》两遍，查核《辞源》引文一遍以外，我认真审读《辞源通考》三遍，查核《辞源》引文一遍，查核《辞源通考》中的考证涉及其他书的引文一遍。查实该书手稿引证、释文、标点、体例等不当之处若干，这在150万字的书稿中，已经算是精品了，原稿差错率不足万分之三。这不但说明田忠侠先生的学识渊深精湛，而且体现了一个考据学专家治学的严谨，高度的学术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，这便令人联想到有清乾嘉考据学派之遗风与承传了。由此及彼，更令人悟出：像田先生这样博闻强识，稔熟传统文化中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文献，而又精于考据的博通学者，如能从事大型辞书之编（撰写词条）、审（书稿之体例、收词立目、注音、释义、书证、溯源、义项次第排列、行文表达）、查（核书证）、校（改正词条稿件之疏失），对

于提高大型辞书的学术品位、编校质量，该是何等有益之事啊！只可惜他居处边远的哈尔滨，若是住在京、沪、渝、汉等地，工作起来可就方便多了。将对学术事业大有补益。

通过编审通读《辞源通考》，待我亲到他家逐条一一核实考证所引的原书文字二十余天，发现他稔熟诸多历史事件、人物、书目、典籍、掌故、嘉言、善行，中医学、佛学及成语、地名、姓氏之源流，随口背诵古书文句，对于古书版本之精熟，对于各学科领域之博通，时时令人惊叹。我对田忠侠先生觉得实在可亲、可爱、可敬、可仰。田忠侠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，有田先生这样一批知识分子，是中国社会、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国辞书事业的支柱。22年来，田先生对洋洋1131万字的四巨册《辞源》能够通读三遍，探究其间奥妙，写出150万字的学术考据力作《辞源通考》来，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事业的执著、追求、严肃认真、锲而不舍、精益求精的品格，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。我也更为田忠侠先生的学识渊博，敢于追求真理，不迷信大方之家的风范所折服，若不是精通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版本、目录、校勘、历史、地理、佛学、中医学、辞书编纂等各方面知识，是绝对写不出这样高水平的皇皇巨著的。

《辞源通考》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，是显而易见的。《辞源》是我国优秀的极有影响的大辞书，经常被人们使用，《辞源通考》指出它的失误之处，有助于人们正确使用《辞源》，这是其一；《辞源通考》于《辞源》的考订，对今后修订完善《辞源》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，这是其二；《辞源通考》于《辞源》的考订，提供了修订《辞书》的样板，对人们修订各种辞书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，这是其三；《辞源通考》于《辞源》的考订，对辞书编纂者编纂辞书，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，这是其四；《辞源通考》于考订具体条目时，随处阐发了一些关于辞书编纂经验、教训，体会与辞书理论的见解，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这

是其五。作者对《辞源》考订的方法，虽然尚未来得及总结出具体的条例，读者却可由此学到考据的方法，这是其六。最后，更重要的一点是该书成为中国辞书史上一个创举，一座高峰。前清道光七年，训诂学大师王引之奉道光皇帝之命考订《康熙字典》，鉴于乾隆年间王锡侯《字贯》一案之惨烈，不敢多所是正，仅考《康熙字典》引书之误2588条，成《字典考证》一书传世；其后日本人渡部温著《康熙字典考异正误》一书，考证《康熙字典》4700余条错误；1984年，王力教授著《康熙字典音读订误》5200条，专订其注音之误。都是限于条件和研究方向乃如此。而田忠侠教授却以一人之力，历时22年，从收词立目、注音、释义、书证、词语溯源、辞书体例等十五大方面，考订《辞源》7175条，都为150万言，这是前无古人的一大贡献，实为《辞源》再订的一大功臣，必将在中国辞书史上留下他光辉的篇章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永恒的记忆。

编审书稿中，偶或遇到须待继续讨论的个别条目的考辨，似乎不急于作出结论；某些条目于考、辨、订、补中的个别议论，是否完全必要；一些相关相类条目之表述，体例是否需要完全统一如辞书之规范；亦曾与著者交换意见。田先生认为：

本书为纯学术考据专著，援引经、史、子、集各部文献对《辞源》某些条目施以考、辨、订、补，必须凭藉典籍而提出明确结论，以供读者、编者、出版者的参考。至于当否，学界同仁仍可继续商讨，以求学术进步。所以，著者不能议而不决，考而不作结论，因而也无所谓“急于”。

体例，在《辞书》编纂中必须严格而统一，也是评价辞书的重要标准；而对于本书学术考据专著来说，固须有一定体例，但却不宜如辞书体例之严格一律，似乎可以略有差异，也无伤大雅。

学术考据，援引典籍，论辩是非，固须议论，至于议论到什么程度，是可以商量的。

我们尊重著者上述意见。也不强求著者按我们意见修改书稿。

本书有些地方体例不一事出有因，如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的写法，《辞源》原书，大多写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，个别写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，我们一仍原文。该书书名实际为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，所以在作者稿件中，我们都根据实际书名写法，不作统一。从而一本书

中，出现了同一种书，有两种写法似乎体例不一的情况。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。

责编其书，通读、考校、审订，废寝忘食，殚精竭虑，提心吊胆，力求做成精品，惟恐出一差错。但力之不逮，可能遗憾不少。呜呼！何时天下能有无错之书，让爱书学子尽得欢颜？在该书出版之际，感慨良多，匆匆写了以上的话，聊供读者、专家、学者参考。

是为序。

林 玉 山

2002年8月

于福州知耻斋

自序

仲尼先师有言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^①后学乃悟：《辞源》者，学人之利器也！

执利器以进，攻则易克，战则易胜。置诸案头，勇气、耐力、信心俱焉。

人之生命，得以诞育、成长、兴旺、发达，乃至延续，不可须臾或离者，布帛菽粟是也。学人既居学术之王国，为求新知，探索异境，而往宝山，乃欲穷其源、竟其委，必检《辞源》。则《辞源》者，学人之布帛菽粟，不可须臾或离者也。赖其滋养，乃获勇力，至于宝山，得其璞也，理其璞而取宝焉。是以学术文化为之进步矣。则《辞源》为促进人类文化进步事业之功，亦大矣哉！

历尽“文革”浩劫，日月重光，百废待举，乃撰治学随感录《壮志篇》十三则，以劝学，其一曰《路》，尝云：

茫茫宇宙，混沌初开，天下本无路。

有勇者出，于荒山乱石间，荆棘丛生处，伐山掘石，开辟路径，奋然前行，乃至在人类艰难的前行中流血、牺牲。

后继者不惧千仞之高，不畏万里之遥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五洲四海，道路纵横，连成一个完整的世界。大路延伸，通向理想，通向未来，通向无限的新宇宙。

那曾开辟各种道路的先行者啊，后世子孙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开创之功！

学问之道，“譬之宫墙……夫子之墙数仞，

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^②之富。^③”欲求其门，当循路径，而后乃可登堂入室，以聆玉音，得其真传耳。则《辞源》者，学人欲臻理想境界必由之路也；绝流引渡达于求知彼岸之桥梁宝筏也。赖此以进。既为绝佳之“津梁”，则凡为学者，人人得而乐凭之也。

人类不断繁衍，科学、文化日新月异，渐觉先前已有之路过狭，已有之桥梁不足承载；于是有人指摘前贤限于时、限于地、限于力、限于物而如彼，曰先前之路，某处路基不牢，某桥尚多缺憾，应如何改进；因而，自当初之荒原草径与独木桥，而改进为赵州大石桥、钱塘江大桥、长江大桥，高速公路，乃至今日之信息高速公路。抚今追昔，当初之荒原草径与独木桥，开创之功不可没，改进之功亦大矣哉！因而，李春、茅以升将永远高踞于中华民族科技史鉴之宝座，接受后辈子孙之顶礼膜拜，永放光彩！

开路，建桥，功德无量！

探究学理，求索艺境，亦须路径与桥。古今中外之字书、辞典、百科全书，是为“津梁”，科学、文化、艺术，皆赖以以进，沟通此岸与彼岸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人类得以高唱凯歌，簸坎铿锵以进，“贫贱忧戚，庸玉女於成也”（宋·张载《西铭》），其又何所惧焉！

人类科学、文化、艺术之结晶——辞书，何等伟大之“津梁”也！

倘能成为如此修桥补路之人，该是何等之幸运也，吾人诚甘乐之。

然而，“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

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!”^④欲从师者,必择精良。则《辞源》者,学人之良师也。叩函发帙,如对良师;执经问难,必得广益。

固然,师非完人,经典亦非完帙,真理尤须完善。后学于《辞源》(修订本)其书,朝夕诵悉,未尝废离,恭承嘉惠者固多,然亦偶见其失,即欲张皇幽眇,补苴罅漏,匡其不逮,臻其完善。此正西哲亚氏之所谓“吾爱我师,吾尤爱真理”之意。滔滔汨汨,逝者如斯,人固不可二人同一河流。惟以勇往直前,方可“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也。

22年(1979~2000),三读《辞源》,三为考订,涵泳其间,沧海求珠,时获宝焉。含英咀华,锲而不舍,既“游文章之林府”,乃更“嘉丽藻之彬彬”,“于是沉辞拂悦,若游鱼衔钩,而出重渊之深;浮藻联翩,若翰鸟缨缴,而坠曾云之峻。”^⑤遂而濡翰操觚,即“慨投篇而援笔,聊宣之乎斯文”,乃成《辞源通考》其书云。计考7175条,都为150万言。

巍巍《辞源》,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于其微瑕,虽或纠弹,期于改进,臻其完善耳,非曰能之,愿学焉。彭铎教授有言曰:“草创者难为功,纠摘者易为力。”^⑥此正前清三大考史名著之一、赵翼《廿二史劄记·一·各史例目异同》之所谓:“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,有

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”之义也。先贤余嘉锡老先生尝以《四库提要辨证》一书,荣膺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之光宠,尝以纪晓岚作《四库提要》与己之为《辨证》相较,慨乎其言曰:

然而,纪氏之为《提要》也难,而余之为《辨证》也易。何者?无期限之促迫,无考成之顾忌故也。……譬之射然,纪氏控弦引满,下云中中之飞鸟;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。易地以处,纪氏必优于作《辨证》,而余之不能为《提要》,决也。……余之略知学问门径,实受《提要》之赐,逮至用力之久,遂倚拙利病而为书,习惯使然,无足怪者。^⑦

大哉余公,诚哉斯言!后生如我辈虽学力不逮,而其诚笃恳切之心盖与余公相通焉!识者剔瑕以存玉,莹洁而悦目矣;倘或因瑕以弃玉,因噎而废食,因小乃失大,愚不可及也。

谫陋自知,无以文饰;献芹献曝,在野愚诚。惠而教我,请洒潘江,各倾陆海,诚所望于读者群公也。

著者 田忠侠 谨识

于哈尔滨 寓庐 致雪山堂

2000年7月2日

①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②官,即馆本字,意为房舍。依俞樾《群经平议》、杨树达《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》卷一之说。

③见《论语·子张》。

④见唐·韩愈《昌黎先生集·十二·师说》。

⑤见晋·陆机《陆平原集·一·文赋》。

⑥见彭铎《潜夫论笺校正·凡例》,中华书局,1985年9月1版。

⑦余嘉锡《四库提要辨证·序录》,中华书局,1980年5月1版。

凡 例

一、本书乃全面考订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之作，亦可视为工具书。所收 7175 词条之排列，大体依照 1979~1983 年版《辞源》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册页码次第为序，以便与原书参校、比勘、取舍。亦有偶因考辨之需而调其次序者。

二、本书所收各条，皆著者通检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时遇疑考索，自出己意，所论要当有据。凡其他专家学者考辨而公诸报章并为本著者所见之者，概不收录，以成一家之言。

三、本书凡于古圣今贤之研究成果有所引述，必详注：时代、作者、书名、卷次、篇目，乃至出版者及版次，既便读者覆按原文，亦示不敢掠美，兼表钦敬之意。

四、本书每条词目之后括注阿拉伯数字，即为该词目于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之页码、栏数，便于读者参校原书。

五、本书每条词目，先引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释文，或撮录要点，然后，提行以“按”字标出著者考、辨、订、补之意，俾清眉目。

六、按语或考某条数项之失，则以一、二、三……标出，俾便读者一目了然。

七、读者使用本书，应与《辞源》（修订

本）对勘。可依本书目录或索引提示，于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对应条目作出标识，便于日后检索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时知所参校、比勘、取舍，或有助益。

八、本书凡于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技术失误，不施考辨，订误而已。以别于其他学术考证条目。

九、为便排、校技术并省读者目力，本书大体以简化字排印，倘行文论辨所需则偶用繁体、异体、乃至甲、金、篆文。或繁体本有区别，而简化字作异体处理，则从辞目或引文、论辨之需，亦仍繁体，以免混淆古今语义。此不得已之举也，轻易不用。

十、本书之末，另附所收词目之汉语拼音索引，以备检索之需。又，因本书以简化字排印，而《辞源》（修订本）乃以繁体字排印，为免两书龃龉，故本书只得割弃部首笔画法、四角号码法两套索引，敬希读者鉴谅。

十一、本书凡引《辞源》修订本原文，皆以其四册一版一次本为准。其后历次重印或有挖改字句，未遑一一参校，务请读者注意，免生疑误。

绪 论

中华古国之历史，潺湲绵邈；学术文化，灿烂辉煌。伴随学术文化进步之需，而产生辞书，则辞书亦即其时之学术文化发展高度之集中体现。沿波讨源，我中华古国之辞书编纂事业，亘古亘今，源远流长矣。且不论殷人甲骨刻辞中之干支纪历推算表，即以周宣王（公元前 827～公元前 782 年）时代太史籀所编《史籀篇》为计，迄今已有 2800 年之历史矣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所言：“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或异”可证。而且，早于许慎班固（公元 32～92 年），于其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业已著录。

或曰：《史籀篇》以下，秦人李斯、赵高、胡毋敬分撰之《苍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合而称之曰《苍颉篇》者，皆小学识字课本而已，尚非字书；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小学家后序云：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汉兴，萧何草律，亦著其法，曰：‘太史试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又以六体试之，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。……’六体者，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隶书、缪篆、虫书，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，摹印章，书幡信也。……《史籀篇》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。《苍颉》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；《爰历》六章者，车府令赵高所作也；《博学》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《史籀篇》，而篆体复颇异，所谓秦篆者也。”学童入学之初，乃从造字之本（六书——汉字结构原理）入手以学，殆即字书之用也，固为辞书之源头矣。降及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（公元 100 年），许慎著中国历史第一部完善字书《说文解字》，流传至今，为千古文

字、训诂之宝典，即以六书原理为 9353 篆析解字形，训释本义。皆上承《史籀篇》、《苍颉篇》之遗风馥韵以为之也。而今，验之以《苍颉篇》辑本释文方式①：

𤇗，炊也。字从白，持缶。缶，甑也。

𤇗，为灶口，收以推柴内（纳本字）火。

𤇗，速疾也。字从马，史声。

𤇗，豕所居也。字从口，豕在其中也。

释文体例，一如后世《说文》也。

示，视也。

禎，善也。

芸蒿似邪蒿，香可食。

豺似貉，白色；豺似狗，白色。爪牙迅快，善搏噬也。

猯似狸，似猫，搏鼠，出河西；似猕猴而大，苍黑色；江东养之捕鼠，为物捷健也。

释文体例，一如后世《尔雅》也。

① 注：参钱剑《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》P5，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 1 月，北京 1 版。

粿，饼饵也。江南呼为青粿，音还。

今江南谓斫削木斤为梯，关中谓之札，或曰梯札。

潏，汗洒也。江南言潏，山东言潏。

坑，以泰和之。今中国人言坑，江南言龑。音瑞。泰，古漆字。

释文体例，一如后世《方言》也。

则古初小学识字课本《史籀篇》、《苍颉篇》，已肇辞书之端绪，殆无疑义也。

且夫，保存完整、流传至今而仍为今日学人常用之《尔雅》，乃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之语义分类辞典，虽其成书于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，乃由春秋至战国历代学者纂集诸书训诂资料，累积递增而成。稽考先秦典籍只鳞片爪之训诂方式，亦足见其端倪：

《左传·庄公二一年》：“大崩曰败绩，得僇曰克。覆而败之，曰取某师；京师败，曰王师败绩于某。”

《左传·庄公二七年》：“凡诸侯之女，归宁曰来，出曰来归。夫人归宁曰如某，出曰归于某。”

《左传·庄公二八年》：“凡邑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，无曰邑。邑曰筑，都曰城。”

《左传·庄公二九年》：“凡师，有钟鼓曰伐，无曰侵，轻曰袭。”

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楚子曰：‘非尔所知也。夫文，止戈为武。武王克商，作《颂》曰：载戢干戈……又作《武》，……其六曰：夫武，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

民、和众、丰财者也。……’”

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季康子问政於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‘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’”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《书》曰：‘洧水警余。’洧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”

此皆春秋时代于字词形、音、义及名物之训诂。诸如此类，代相累积传递，以成后世之《尔雅》，则《尔雅》之端绪，肇始於春秋也。准此，确切概念之辞典，迄今亦有2500年之历史矣。

而西方学人，言及物质文明、精神文化，往往言必称希腊。希腊确为西方文明、文化之源头，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所呈现之文化繁荣灿烂奇景，令人神往；其所涌现之三位学术文化大师：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斯多德，永远高踞于人类童年文化峰巅之上，令后人顶礼膜拜。其时之语言学十分发达；然而，作为文化学术集大成之结晶——辞书之编纂，却略逊一筹。虽史载其公元前2世纪已有字书家35人，而其辞书却未能流传于后；直至公元2世纪之《荷马词典》，始为西方古老辞书之雏形，今所传世者，仅为缩略本，惜乎，不得窥其全豹也。逮及公元1612年，意大利佛罗伦萨学士院编纂之《词集》问世，方为欧洲民族语词典之传世者第一部；其时，我国明代两部影响深远之《字汇》（梅膺祚撰）、《正字通》（张自烈撰）已相继问世。而前此之辞书流传於世者，殆数十百种。回首东方，近邻日本，直至五十三代天皇淳和天长七年（公元830年），始有空海法师编纂之《篆隶万象名义》，以汉文注音、释义而问世。环顾东、西方辞书编纂史，与我中华古国辞书编纂史相校（公元前3世纪《尔雅》成书，公元1世纪初《方言》问世，公元100年《说文》成书），不能不为我中华古国文化源远流长，光辉灿烂，辞书编纂事业亘古亘今而引为骄傲与自豪。